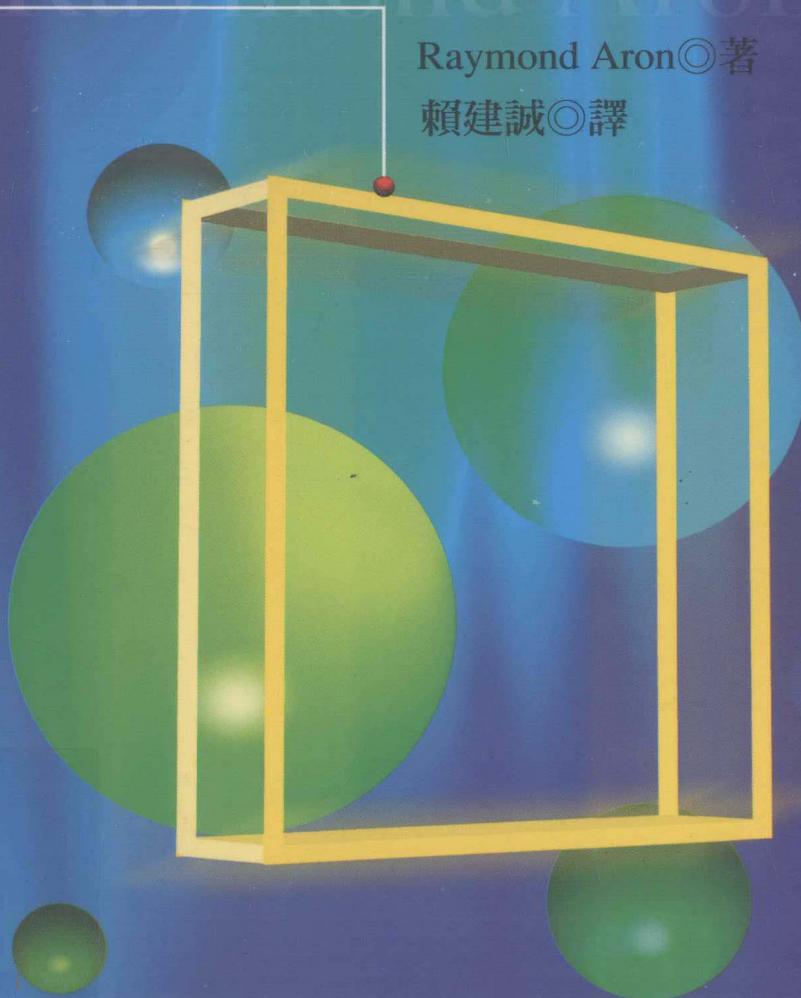


雷蒙·艾宏： 入戲的觀眾

Raymond Aron

Raymond Aron◎著

賴建誠◎譯



Raymond Aron 著 賴建誠 譯

雷蒙·艾宏：入戲的觀眾

Raymond Aron: *Le spectateur engagé*

雷蒙·艾宏：入戲的觀眾

1987年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30元

2000年5月初版第三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Raymond Aron
譯者 賴建誠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 6 4 1 8 6 6 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 6 4 1 8 6 6 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0786-5(平裝)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e-mail:linkingp@ms9.hinet.net

雷蒙・艾宏：入戲的觀眾 /

Raymond Aron著；賴建誠譯。

--初版。--臺北市：聯經，1987年

面； 公分。 含索引

譯自：Raymond Aron : *Le spectateur engagé*

ISBN 957-08-0786-5(平裝)

[2000年5月初版第三刷]

I . 艾宏(Aron, Raymond, 905-1983) -訪談錄

784.28

89004610

1

1. 年輕時代的艾宏
2. 寫作中的艾宏，
1954



2



1

1. 沙特
2. 辦公室裡的艾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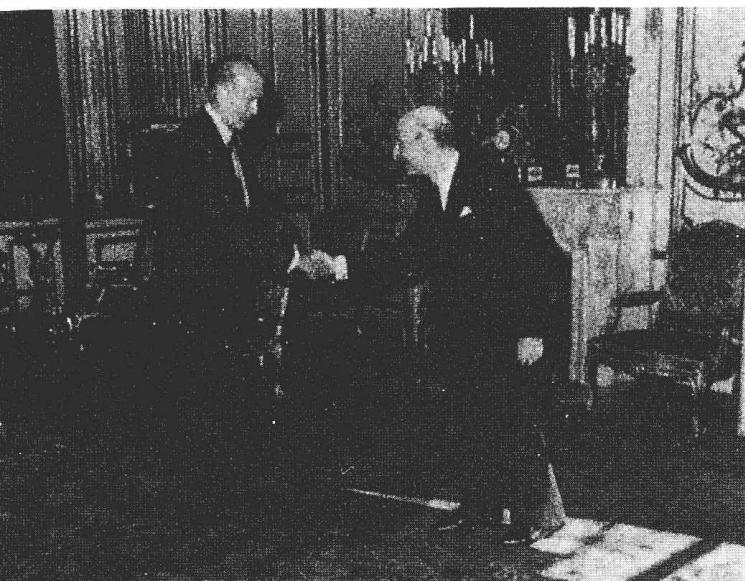
2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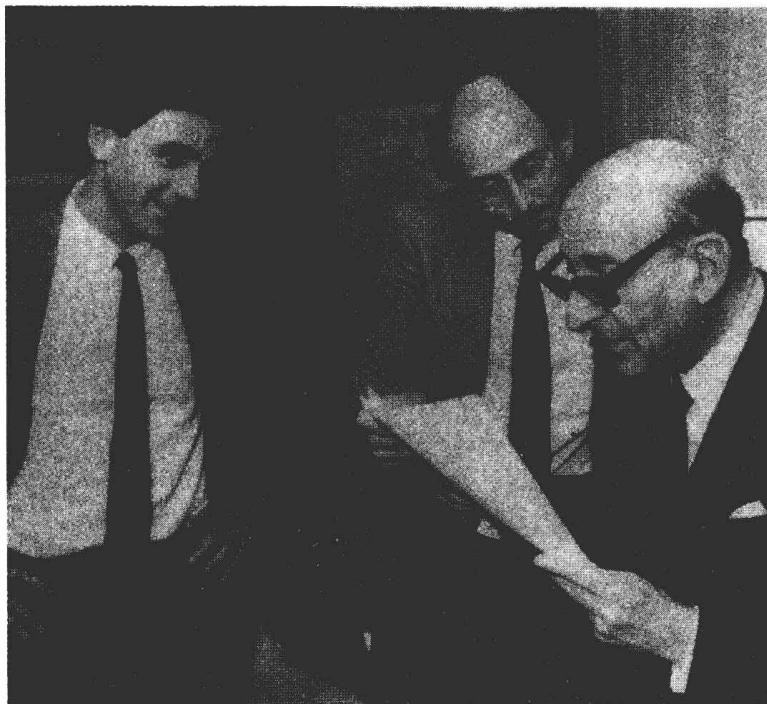


3

1. 辦公室中的艾宏
2. 艾宏與季斯卡，
1980
3. 艾宏與密特朗等
人電視辯論，
1976



1



2

1.書房裡的艾宏
2.艾宏和〔入戲的觀眾〕裡訪問他的渥爾頓與米西卡

譯序

雷蒙・艾宏：一位難以歸類的人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艾宏去法院(Palais de Justice) 出庭，爲他的老朋友 Bertrand de Jouvenel^①（作家、名記者、思想家）作證，事因 Jouvenel 控告另一位作者譖謗說他是法西斯分子。事後走出法庭時，艾宏心臟病舊疾復發，雖緊急送到附近在市中心塞納河畔的 Hôtel-Dieu 醫院，但終未能挽回，享年七十八歲。當天收音機、電視新聞(尤其在法、比兩國)以頭條新聞報了幾次，重播了他的訪問錄影，又綜述了他的一生及著作。翌日歐洲各語文的日報都大幅追悼這位「世紀的傳奇人物」，這位「沙特的同學和仇人」、這位「既是哲學家、又是社會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又是名報主筆、又是幾部名著的作者、又是在當時法國思想界排名第二的人」（根據〔讀書〕(*Lire*)雜誌一九八一年的調查）。之後，幾個重要的周刊及文藝雜誌又相繼報導了一大陣子。

他所以會這麼富於新聞性，除了他本人就是個少見的「奇才」外，還有一點是同年九月出版了〔回憶錄〕(*Mémoires*)，副題是「五十年的政治省察」(*50 ans de réflexion*

① 見第七章註⑰。

politique)，出版後大為轟動，一個月內銷了十四萬本，且列入了〔快訊〕(*l'Express*)雜誌暢銷排名非小說類第一名達十幾星期，這是法國出版界罕見的事。一九八一年出版〔入戲的觀眾〕一書，也是本暢銷書，短短幾個月內賣了約十二萬本，艾宏也上了幾次電視，加上傳播界的報導、學界的評語、知識界的反應，造成他的〔回憶錄〕大為暢銷，使他在晚年時，在法語區的知識界內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一九八一年四月第六十八期的〔讀書〕雜誌，調查當時尚健在而對法國知識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第一名是一九〇八年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後入法國籍的近代結構主義人類學開創者李維·史陀(Lévi-Strauss)，第二名就是艾宏。艾宏是個多面型、活動力強、說理清晰、常有些好句子、愛表現(上電視、接受訪問)的文化政治學者。雖然日後沙特因兩人見解不同而翻臉不相來往，還寫了幾次侮罵他的文章，說他沒水準、炒冷飯，但這是沙特的任性作風。沙特肯罵的人，是不會太差勁的。本文是譯註他的〔入戲的觀眾〕後，對其生平、著作、影響力的綜合整理及評論。

艾宏不像沙特，他不是個很有原創力的思想家，他是個好活動、能得到中產知識分子支持的人(尤其在立場上和深度上)。對一位未受過正規哲學訓練的人，艾宏是少數幾位能讓人看懂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回憶錄〕是半世紀的法國知識界、政界、報界、世界局勢、世界要人交往史的記錄，但將近八百頁，譯註起來是個大工程，而且不容易。〔入戲的觀眾〕採對話形式，是〔回憶錄〕的縮版，且有問有答，立場相對或相和，是〔回憶錄〕的良好替代品。

一、生平

以上說的是新聞性的一面。艾宏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他做了那些事，怎麼有那麼大的魅力，而且歷半世紀不衰？我們把新聞喧染排開，把華麗的形容詞放到一邊，由他的各種活動、著作，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他這複雜閃爍的一生。

一九〇五年三月四日生於巴黎，家庭背景是個典型的資產猶太家族，排行第三，有兩個哥哥，各大他兩歲、三歲，但長大後兄弟間很少往來。他們家族已在法國的洛林省(Lorraine)定居數代，不信猶太教、不上教堂、不守猶太傳統，且已自認為是法國人的成分大於猶太人。當然別人並不一定這麼認爲，猶太人在很多人心中還是猶太人。他父親的在學成績很好，也曾在巴黎大學教過一段時間，但並不順利，後來轉入司法界，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時，在股市中失去了大部分財富，一九三四年憂鬱去世。他一生沒達成的願望是，沒在學術界有所成就，所以把這個希望寄託在小兒子身上。這也是艾宏在五十年代重回學界的一個內心因素。他的成就比他父親所期待的高了許多。

1. 求學

他父母於一九一三～一五年間，在巴黎南郊凡爾賽蓋了座房子，他在那裏上了小學和中學。一九二二年他們賣了在凡爾賽的房子，搬回巴黎定居，一部分原因是小艾宏要上個好學校。他在郊區的學校，程度比不上巴黎的中學，尤其如果他想進好大學的話。他在凡爾賽中學成績不錯，班上第八名，選的是哲學、文學組(Section A，相當於臺灣從前的乙組)原因是「用觀念比用符號、數字暢順得多」。依他回憶錄所說，數學卷上常是一片大紅，從此畏見公式、符號，但他的哲學課常有特殊表現，好幾次上臺唸作文給同學聽。

一九二四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學哲學。這是法國最難進的學校之一，中學畢業後要進一年預備班，然後會考。這個學校對他一生是個很決定性的因素，他班上出了幾位大師級的人物，除他之外，還有沙特、Nizan 等幾位。一九二八年畢業後，他參加國家哲學考試，高中榜首。但沙特卻落榜，隔年再準備，因而認識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兩人同時通過會考，也開始了世上少見的一對天才伴侶的故事。沙特第二次重考也得了第一名，成績比艾宏還高一分。波娃則是法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通過該會考的女性（二十一歲！）。

畢業、通過哲學會考之後，一九二八年十月到一九三〇年三月間服兵役，在空軍氣象測量站工作，後被調到 Saint-Cyr (戴高樂所讀的軍校，法國的職業軍校)，後來沙特也因他的關係到那裏服兵役。

一九三〇年春季，他找到一個在德國科隆大學當法文助教的職位，開始了學界生涯。沙特後來也是因他的關係去德國留學。那時學哲學的人去德國，就如今日學自然科學的人去美國一樣。一九三一～三三年，他轉到柏林，是他留學生活中最豐收的一段時期。在知識上，他與當時幾位哲學、社會學名家及其弟子、學生交往，學了不少。在學界方面，他認識了幾位法國名作家、學者，他們到柏林交換訪問，艾宏和他們有了初步交往，包括日後對他在學識、政治上相當有影響的馬勒候 (André Malraux，戴高樂時期的文化部長、名作家) 在內。那四年的留學生活，依他說，使他在知識上從一個青年轉入成年的階段。

2. 青年

一九三三年回國後，因為他是師範畢業，所以到法國西北 Le Havre 港的中學教了一年書。一九三四～三九年回母

校圖書資料處做點行政、研究工作，出版了〔當代德國社會學〕（見本書末著作介紹），開始了真正的學術工作，也引起一點注意。一九三三年到 Saint-Cloud 的師範學校教書，同時也開始準備他的博士論文：「歷史哲學導論」，副題是：論歷史客觀性的限度。一九三八年通過口試，口試委員之一。Paul Fauconnet 是涂爾幹 (Durkheim) 的學生，說艾宏的論文是「又敬佩，又怕學生會跟不上他的想法」（〔回憶錄〕，頁 105）。

那時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日熾，德法關係吃緊，德軍出兵法國東北部的亞爾薩斯，戰爭爆發。艾宏被徵調到東北部 Charleville 的氣象站服役，手下帶了十幾名士兵，沒什麼大事可做，偶而放幾個氣球測量氣候。後來德軍攻入此地，他帶領那班人隨法軍往內地撤，一路上見到法國的敗軍及流離的百姓，知道法國已撐不下。之後輾轉到南部的吐魯斯 (Toulouse) 城和他太太會合，然後獨自轉到西南部一個小港，搭船前往倫敦。

當時戴高樂在倫敦組「流亡政府」，以別於在法國本土受德國支配的法國政府。艾宏到了英國，被派入部隊當會計員。過了一陣子，有人從前讀過他的文章，把他拉到〔自由法國〕 (*La France libre*) 去寫時事評論。那份刊物是戴高樂辦的，是當時唯一在海外發行的法文刊物，表達法國知識分子在倫敦的心聲，對象除一般讀者外，也以倫敦的政治、軍事、社交圈為對象。這段經驗引他入了報界，直到他去逝為止。

3. 報界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艾宏回到了巴黎，找到了從前的老同學、朋友，如沙特、馬勒侯等人。戰前吐魯斯大學和西

南大港的波爾多(Bordeaux)大學，都曾給他機會任教，但他戰後回法國，並沒去教書。原因之一是他想住在巴黎，但依他自己的說法，更重要的原因是得了「政治病毒」：對政治有了興趣。戰後的西歐一片殘敗，生活很苦，他又無產業積蓄，於是作了一個事後自認不合理性，但對他後半生具關鍵性的決定：放棄大學教職，入了報界，在〔戰鬪〕(*Combat*)報上寫社論及時事分析。〔戰鬪〕的主編是馬勒侯的好朋友，那時〔戰鬪〕有幾位那時已經、或後來在思想界成了重要人物的記者：考夫曼(P. Kaufmann)、梅洛一龐帝(Merleau-Ponty)、Albert Olliver、卡繆(Camus)、莫里亞克(Mauriac，後兩位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等人，環境和氣氛都是一流。他的第一篇報紙文章就是在〔戰鬪〕登出的。他認為在〔戰鬪〕那段時期，是他日後在報界幾十年中，印象中最好的一段時光。但這份在二次大戰中，以地下抗德報出身的報紙，內容在戰後變得水準過高，單看編輯、社論部那幾位成員就可想而知。報紙叫好不叫座，而且這幾位人士在紙上很行，做起生意方巾氣太重，又沒個頭，資本又不足，後來被J. J. Servan-Schreiber 買下，當了老闆。他就是寫了〔美國的挑戰〕及〔世界的挑戰〕這幾本名著的作者，在知識界、政界風光過一大段時間，後來又辦了〔快訊〕周刊，影響力相當大。但後來又被艾宏接下，其中許多恩怨複雜，這是後話。

一九四七年他進了屬於右派言論的最大報〔費加洛〕(*Le Figaro*)寫社論，尤其是時事分析評論，寫了卅年，到了一九七七年因心臟病入院才離去。他在〔費加洛〕的卅年間，是他這一生最閃耀、最受議論、思想最複雜的階段。他的主要著作、活動也是在這卅年中最豐富。以下從他在政界、報界、論戰、學界活動來速描他的主要經歷。致於他的學說則在一節中，依其主要作品分述。

4. 政治

從他與政界人士的交往說起。二次大戰期間，他在〔自由法國〕上寫文章，那是戴高樂將軍在倫敦「流亡政府」的「機關報」。戴高樂有時也先看校稿，在空白處註意見。他對艾宏的文章打了幾個 B (Bien : 好)，但從未打過 TB (Très bien : 很好)，B 是戴高樂打過的最高分數。這說明了艾宏在戴高樂集團下，有其一席，但在看法上，他又是個堅持己見的書生。戴高樂有次說艾宏不能算是個戴高樂派的人，但戴高樂卻是艾宏心目中最可稱得上「君主」(Prince) 的人。

一九四五年勝利回巴黎後，馬勒侯出任戴高樂第二次政府的新聞部長，他找艾宏去當辦公室主任，主管報紙、雜誌的出版、登記、及紙張配額。因為戰時有些報紙被納粹停刊，有些親德，戰後需要做個清理，而且那時物資缺乏，紙張的配額也要管制。艾宏做了兩個月，每天要接見出版界人士，問題複雜、工作又累，這是他這一生僅有的一次官職。後來戴高樂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辭職，艾宏就到了上面說過的〔戰鬪〕報，從一九四六年三月到四十七年六月。那是第三共和時期的事。第四共和期間（一九四七年一月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的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獨立戰爭事件），艾宏的主要活動是在報界、論戰，與政界少有直接來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戴高樂復出、修憲，是為第五共和之始，後因六八年五月事件（類似中國的五四運動，但影響較廣，波及全世界）而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再度辭職。這期間，艾宏與當時尚未當選總統的龐畢度見了幾次面，但他事後寫的文章又不客氣。龐畢度和戴高樂一樣，對艾宏真沒辦法，後來季斯卡當財政部長時，艾宏在報上評擊財經措施，季斯卡接見了他，很禮貌但也很堅定的告訴他，說他只指出缺點，

而沒說出具體可行的措施。艾宏答說，您是部長，您有一羣幕僚，而我只是單槍匹馬的記者，而且我的工作是在批評。依艾宏自己在傳記上說，季斯卡是唯一容忍過他的首領。當然，艾宏是季斯卡在國家行政學校（ENA）讀書時的師長輩，那又是另一回事。艾宏和密特朗及他手下幾位主要幕僚也有來往，而且都是他的學生輩，但一左一右，沒什麼話頭。

關於政治，艾宏在回憶錄上說：「搞政治思想，需要儘可能的理性；但搞政治，那就必須要利用他人的激情。所以政治活動必然不純正，這也是我寧可搞政治思想的原因。」他也說：「政治，要不就贏，要不就別搞」。基本上，艾宏是個知識分子，太講理性與邏輯，這當不了政客，而他又在政界中來往，這也是沙特看不慣他的因素之一。

5. 論戰

現在來談他在報界與論戰的事，這是他對法國知識界產生最大衝擊，也最受議論之處。艾宏在一九四六年加入了那分水準太高而且管理有問題的〔戰鬪〕報，同年沙特和波娃合辦〔現代〕(*Les Temps Modernes*)，拉了艾宏、卡繆、梅洛一龐帝等朋友、同學助陣。艾宏只寫幾篇，其他人也不很積極。更重要的因素，是這幾個人的政治見解在基本上互不相容，尤其是美蘇冷戰開始之後。這是有遠因的。

二次大戰德國佔領法國期間，以貝當 (Pétain) 元帥為首的維琪 (Vichy) 政府在戰後被視為叛國政府，右派的戴高樂在戰時也不在國內。真正抗德、犧牲生命的是些抗德志士 (*résistant*)，這些人常有英勇不顧身的表現。尤其在巴黎地區，常有些抗德志士身懷炸彈與德軍同歸於盡，深受民眾擁護。這些人士大都是共產黨員。巴黎不是盟軍解放的，而是自己解放的 (Paris se libère)，所以戰後的共產勢力在

巴黎（全法國也是）有絕對的優勝。這是實際政治面。

連帶的，在意識上，幾世紀來歐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出兵，把世界弄得紛亂不已。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乃想尋求可拯救人類社會前途的方針。共產黨員的英勇、蘇聯在戰爭末期的出兵，這些人所舉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旗號，當時大部分最重要的知識分子，都走向了這個描繪出美景的主義。在法國，沙特、卡繆、梅洛—龐帝、阿度塞（Althusser）是這派的主將，而艾宏是弱小右派的孤將。

艾宏很明顯的告訴他們，蘇聯在大戰期間屠殺德軍的行為，不比納粹屠殺猶太人好多少；戰後的蘇聯以集中營的方式對待異己分子，那不會是個理想國。在意識上，他引了馬克思的話：「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再進而推說：「馬克思主義是知識分子的鴉片」。雙方正式絕裂，相互攻擊、不相來往，這個一九四七到一九五四的大論戰，後來集文出版，書名為〔論戰〕（*Polémiques*, 1955）。艾宏在年輕時曾加入法國社會黨，但沒持續多久。那時左派是個熱門派，反左等於沒血性，在同伴間無法立足。艾宏這一生都反左、反馬克思主義，但一直贊揚馬克思在思想上的貢獻。這是兩回事，因為馬克思自己也說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五二年，艾宏加入戴高樂的「法國人民黨」（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 R. P. F）。一九四七年由戴高樂組成，一九五三年解散，後於一九七六年復起，改為 R. P. R (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共和聯合黨，現任巴黎總理的 Chirac 為此黨領導人物。) 之後在政治路線上，就以右派的姿態保持到去世為止，但也不諱言他年輕時的心路歷程。他在論戰方面的著作見書末的簡介。（頁三二〇）。